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權威人格」研究的今昔

On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doi:10.30390/ISC.199809_37(9).0005

問題與研究, 37(9), 1998

Issues & Studies, 37(9), 1998

作者/Author：石之瑜(Chih-Yu Shih)

頁數/Page：67-8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8/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809_37\(9\).0005](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809_37(9).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權威人格」研究的今昔

石之瑜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摘要

精神分析是一個充滿了對現實社會挑戰的學問，權威人格則是一個反映了政治態度的觀念。五十年來的相關研究成百上千，動員了不知多少大學一年級的新鮮人當實驗對象，也採納了日新月異的統計方法，但精神分析與權威人格兩者結合所產生的政治效應，大致未隨著時間的增多而改變。權威人格理論自始就帶著猶太裔左派知識分子的色彩，後來雖然廣泛應用，甚至也解釋了社會主義中國的政治發展經驗，但畢竟中國不代表歐洲社會主義的主流，所以並沒有淡化這個理論的核心關懷，以致於即令是對六〇年代末期學生運動的分析，都引起了這派學者的反彈，因為把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學生看成是自戀性格，令他們很難接受。站在權威人格理論的初衷，被分析的應該是右派（即反社會主義）的種族主義（即反猶太主義）者。一個新的面向在八〇年代中期之後加入了，發生在南斯拉夫（與其他各地）的屠殺、種族認同問題的復甦，與後現代主義的蔓延，正在逐漸改變著當前學術界的政治生態，則權威人格研究恐怕又將獲得新的生機。

關鍵詞：權威人格、精神分析、自戀、政治心理學、法西斯

* * *

壹、權威人格研究的意義

權威人格的研究可以說是當代政治心理學的濫觴，但權威人格作為一個分析概念，迄今沒有一套完整的論述系統，這主要是因為政治心理學家對於與權威人格研究相關的歷史、信仰、人事、組織、理論都有著千絲萬縷的牽掛，涉及到研究者個人的價值、情感和利害，因而在著書立說的同時，不能與所分析的政治現象清清楚楚的區隔，造成人們對權威人格的定義眾說紛云。在基本概念始終無法釐清的情況下，大量實驗與討論依舊蓬勃進行，一九五〇年出版的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問世以後，①五〇

註① T. W. Adorno et al.,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0) .



年代可以說是權威人格的顯學時期，爾後雖然逐漸退潮，但與此相關的論文仍然陸陸續續地發表，直至九〇年代世界各地再度爆發多起種族間的傾軋殺戮，又逐漸為學界重拾回議程上。

這個對當代種族滅絕行動的回應，重新提醒人們有關權威人格研究的起源，儘管時至今日，權威人格研究涉及到心理學領域的方方面面，但最早還是出自於三〇年代希特勒策動的反猶太主義，則殆無疑點。當時權威人格可以說就是法西斯的同義辭，因此所謂人格與政治態度或與信仰等概念之間的分辨並不明確。這是後來研究者對權威人格分析幾個主要的批評之一。^②接著人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方案，來將權威人格與法西斯劃清界線，這些方案包括用保守主義、教條主義、軍國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來取代法西斯，但基本上測量的仍是十分類似的概念，得出的結論也具有相互的共通性，^③不過，對於人格和態度兩者之間的曖昧關係，仍然未能作出蓋棺論定的回答。

不可否認的是，權威人格一詞在自由主義社會中帶有濃厚的負面意義，因此對於研究對象產生相當大的壓力，這些對象在早期往往是屬於某個小範圍的結社、政黨，則和這些研究對象享有類似背景的心理學家就會受到一些壓力。後來的研究對象愈來愈多是校園裡的大學生，他們當然也受到象牙塔中自由學風的影響，故在實驗室或教室裡作答或反應的時候，會自然而然地調整自己的表現，這就構成了權威人格研究的一些偏差。加上什麼是人格又說不清，因此很多人將權威人格量表上的分數，和研究對象的認知、行為表現作統計相關的時候，自變數和因變數之間有什麼理論關係，常常混淆不清，則得出的相關性究竟代表什麼意義，也就眾說紛云。倘若如此，那麼為什麼權威人格研究還這麼吸引人呢？

一言以蔽之，權威人格研究出自於精神分析，探索的是人類內心深層經常不為己知的傾向，這些傾向或信與人們的成長經驗相關，同時也受到社會情境的影響。人對自己的安全感、效能感決定了他／她對權力需要的程度，而權力資源的多寡又往往不能操之在我，則人如何在心理上和行為上自我調適，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就是我們進入社會後必須處理的一種衝動，這個衝動的強弱，所帶來的焦慮的深淺，和各種相應的心理防禦機制，都是在挑戰政治心理學家的課題，故也是對人之何以為人的神祕領域進行搜尋，因而才吸引了研究者持久的興趣。人格與態度之間的界限難分，同時精神分析又是靠主觀推測，這些固然都是權威人格研究的弱點，但這也說明了人為了理解自己是什麼的這個難題，仍然必須繼續鍥而不捨的原因。

貳、權威人格研究者

註② *Political Psychology Special Issue on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1997.

註③ William Eckhardt, "Authoritarianism,"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2, No. 1 (1991), pp. 97~124.



希特勒是一個精神狀態有明顯嚴重徵候的領導人，^④早在一九三三年，挪威心理分析師 Scharffenberg 就連續發表十六篇文章——「希特勒，救世主或蠢蛋」——指出，希特勒患有恐懼症，他的領導將帶來毀滅與戰爭，文中並且分析他的家庭背景，特別是幼年成長經驗如何傷害他的自尊，造成他充滿敵意與猜忌的性格。同時，Scharffenberg 推測希特勒過去在一段從事非技術勞力期間，曾遭猶太人與共產黨辯輸過，從此種下他心中的深仇大恨。Scharffenberg 甘冒大不諱，甚至充滿挑釁的分析，引起德國的憤慨。但他深諳納粹的性格，知道絕不能與希特勒妥協，而他一生最重要的時刻，正是在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四日的一次演說中，一改過去鼓吹共和主義，反對君主立憲的立場，他現在反對挪威國會領袖所建議的，讓國王退位來安撫德國占領軍，因為他認為國王無論如何已經是挪威獨立地位的憲政象徵，那次演講至今仍為人所傳頌。好在德國為避免他對希特勒的批評再度受到重視，沒有將 Scharffenberg 繩之以刑。戰後，他率先強調包容，反對死刑，質疑法院程序，並為那些與德國占領軍戀愛甚或懷胎的婦女說項。^⑤

相對於 Scharffenberg，後來的權威人格研究雖然也充滿道德和政治的氣氛，可是事後看來都沒有那種正義凜然。當時，人們的疑惑並不只是希特勒這個人而言，同時也是眾多德意志人民前呼後擁的感恩戴德情緒，為什麼那麼容易受到煽動。的確，早在一九二五年的德國看來是如此的自由開放，^⑥這種一夕變天的政治文化令人迷惘。戰後的權威人格研究者一直難以釋懷，有一種必欲歸因於德國人民人格缺陷而後已的情緒。

權威人格的研究與心理學家的生活經歷息息相關，Adorno 等人的開山作品共列了四位作者：Adorno, Sanford, Levinson 和 Frenkel-Brunswik，通稱 Berkeley 小組，但研究計畫本身則是由小組和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共同合作推動。Adorno 是 Institute 的重要成員，其主持人是 Horkheimer。Institute 的創立可以回溯到俄國革命，是左派的一批學者覺得有必要成立獨立於俄國政治之外的馬克斯主義研究力量，他們在 Frankfurt 大學成立了 Institute，Horkheimer 是在一九三一年起擔任主任。這批猶太裔的馬克斯主義者在希特勒當政之後逃亡，經由瑞典、法國、英國，最後在紐約立足。從此他們必須開始使用美國學界熟悉的經驗學派語言。在美國，人們講的是自由主義與新政，不是馬克斯主義或革命，以致於 Horkheimer 把他在一九三六年所提出的與權威性格相對的「革命性格」，務實地改成了「民主性格」。而從一九三九年之後，Horkheimer 就未再發表過馬克主義論戰方面的文章。他和 Adorno 把精力轉向反猶太主義的研究上，故即使在麥卡錫反共主義盛行的時代，他們從猶裔財團那兒仍爭

註④ R. G. Waite, *The Psychopathic God: Adolf Hitl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L. Heston and K. R. Heston, *The Medical Casebook of Adolf Hitler: His Illness, Doctors and Drugs* (New York: Stein and Day, Briarcliff Manor, 1979).

註⑤ Nils Johan Lavik, "A Psychiatrist Who Confronted Nazism,"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0, No. 4 (1989), pp. 757~765.

註⑥ William L. Shir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0).



取到一定的財務支持。^⑦

Horkheimer 在一九四三年開始與 Sanford 接觸，Sanford 和他學生 Levinson 發展了第一套測量反猶太主義的量表。^⑧Adorno 原來稱反猶太主義為法西斯性格，後來改稱之反民主性格，最後才又改為權威人格。這個權威人格的概念距離 Institute 的唯物主義哲學和批判主義已經很遙遠，這只能說是學術生產的資源並不掌握在 Institute 的手中，實在無可奈何。但如果另外從整套研究計畫的精神分析那部分來追溯權威人格概念的來源，會發現仍不能脫離馬克斯主義，而應該說是馬克斯主義和佛洛伊德學說的結合。

最早是 Reich 分析德工人運動不振的原因，將資本主義的壓迫在觀念上移轉成家庭父權的壓迫，並認為法西斯主義是德國父權文化的產物，奠基在德國工人與中低階級的性格缺陷之中，經由性文化的壓抑與恐懼，造成人們對國家威權主義與帝國主義的認同。^⑨Fromm 同樣作了馬克斯主義與精神分析的結合，也對家庭的角色、父權、性道德提出了雷同的分析。^⑩他並指出人心潛藏的內在趨力，是受到社會經濟條件的制約，並分析了對權威的尊崇與反抗的奇特共生。Fromm 來到美國之後，不再視法西斯主義為最大的威脅，而一心一意想將孤立退化的公民文化昇華成愛心與創意的性格，這才應該是他研究的新重點。^⑪

Berkeley 小組與 Reich 和 Fromm 的接觸可能是很間接的。在小組工作中，Brown 負責 Los Angeles 的資料蒐集工作，據稱他曾作出了「重大的理論貢獻」。^⑫Brown 和 Fenichel 在三〇年代就合作研究，而現在 Fenichel 也在 Los Angeles，Fenichel 和 Reich 在 Vienna 精神分析界曾是暱友，並與 Anna Freud 交好。由此看來，很可能 Brown 就是最先將反猶太主義和權威人格銜接的人。^⑬他在一九四〇年起就曾討論這個問題，認為反猶太主義是內在罪惡感一種理性化的投射。相對而言，Adorno 在這方面的貢獻幾乎是空白，他甚至還向現實低頭而不再公開傳播馬克斯主義，並將階級意識之類的分析概念，包裝成所謂有系統的「意見、態度、價值」，則階級被個人化，階級革命變成了自由民主。但因為重點放在研究反猶太主義，在冷戰正熾之際，遭人批評為找錯對象，這正是人格和態度能否或應否區分的辯論起源，政治上的反共風潮要求分析

註⑦ William F. Stone, Gerda Lederer, and Richard Christie, "Introduction," in W. F. Stone, G. Lederer, and C. Richard, eds., *Strength and Weakness: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Today*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92), pp. 1~21.

註⑧ D. J. Levinson, and R. N. Sanford, "A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Anti-Semitism,"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17 (1994), pp. 339~370.

註⑨ W. Reich, trans. by T. P. Wolfe, *The 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 (New York: Orgone Institute Press, 1946).

註⑩ E. Fromm,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Rinehart, 1941).

註⑪ E. Fromm, "The Revolutionary Character," in E. Fromm, *The Dogma of Christ* (New York: Holt, 1963), pp. 147~166.

註⑫ T. W. Adorno et al., *op. cit.*, p. xiv.

註⑬ Stone, Lederer, and Christie, *op. cit.*, p. 9.



家多注意左派的權威人格，而不是仍斤斤計較於右派法西斯的權威人格。^⑭

隨著社會的變遷，人們對政治的益加冷漠使得權威人格研究背後的價值、情感也好像慢慢淡化，代之而起的，是以方法學辯論為主要內容的學術交流。既然實驗室的工作在當時已經成為取得研究經費的主要渠道，則權威人格研究的重要洞見反而不受注意。質言之就是，關於人格的養成過程如何因為家庭、育兒經驗的不同，而製造了不同的政治人物與政治行為。冷戰的結束帶來了兩個新的挑戰：第一是東歐的劇變以及前南斯拉夫分裂後的種族屠殺，重演了反猶太主義式的悲劇；二是發生在現代化社會各種瞬間的兇殺，摧毀了社會上熟悉的人我分際與倫常規範。這種當事人自己都不能解釋的仇恨，似乎不是態度、認知等概念所能說明的，而有深藏在人格中的某種傾向與需要。

心理學家不能脫離社會情境，也不能脫離自己的需要，這並不是說權威人格的理論充其量只是某個歷史階段的理論而已，而是說人格的養成所造成的政治結果，會因為分析者自己所處的歷史位置而有不同，此何以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會從批判學派轉而進行反猶太主義的研究，並受到新保守主義質疑為忽略了對左派的研究。*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在九〇年代以後，再次被提起，顯然就已經不再那麼受左派、右派之爭所影響，不過，人們仍有其特定的歷史位置，故作為自由主義者、後現代主義者、女性主義者或非西方的各地本土心理學家，依舊會在不同的場合用不同的角度適用、修正、批評它。

叁、精神分析

權威人格理論對人格的分析從人一出生就開始，根據嬰兒成長期間所獲得多少需要的滿足，來判斷爾後長期人格的特質，其中所最受重視的就是權力的概念。權力指的是一種滿足需要的能力，權力不是人主動會去追求的價值，而是在自己的需要不能被滿足時作為補償的一種自衛機制。這些需要包括溫飽、尊嚴、情感、求知、技能、擁有、規範等。^⑮嬰幼兒在這幾方面所獲得的滿足，可以區分成被溺愛或被剝奪兩種極端，而關鍵時期（或稱之為伊底帕斯 Oedipal 時期）就是在嬰幼兒逐漸取得活動能力，接觸範圍擴大到近親以外的那個階段。在這個階段裡，幼兒面對著被保護與獨立兩種誘惑，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如未妥為因應，就會出現被溺愛或被剝奪的情事。只要幼兒能逐漸在同儕團體中模仿成人世界的行為，就可以既保持與成人世界的距離，又

註⑭ Franz Samelson, "The Authoritarian Character from Berlin to Berkeley and Beyond: The Odyssey of a Problem," in W. F. Stone, G. Lederer, and R. Christie, eds., *op. cit.*, pp. 22~43; E. Frankel Brunswik, and R. W. Sanford, "Some Personality Factors in Anti-Semitism,"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20 (1945), pp. 271~291.

註⑮ Harold D. Laswell, "The Selective Effect of Personality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R. Christie and M. Jahoda, eds.,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Continuities in Social Research*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4), pp. 197~225.



不脫出熟悉的親情脈絡，慢慢他們一旦將精力放在某些工作的追求與完成上，如此就轉移並控制了內在毀滅性的衝動，並平撫了伊底帕斯階段的焦慮、恐懼與罪惡感。^⑮

當這個階段的焦慮不能得到妥善因應，人格或者會變得懦弱、依賴，尤其不敢忤逆權威地位的人，男孩子傾向女性化；或者也可能變得充滿叛逆性，侵略性，敵意，則所有象徵權威的地位與符號與都成爲一種對自己的威脅。可見，父母親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他們對幼兒能否提供一個發展自我的可靠環境，決定了孩子是否成爲高度自我中心，敏感而脆弱的人格。^⑯這種小時候內在深層的恐懼，在成長之後，自然投射到公衆人物身上，成爲依附或反抗權威的因素。

權威人格據稱是來自於父親嚴厲高壓管制的家庭，通常母親的角色是順從性的，而父親在言行上對幼兒鮮少表達出情感上的親近。這裡的問題在於，何以母親不能成爲壓迫的來源，或感情剝奪的主角？權威人格分析在這方面的探討大底闕如。事實上來自母親的剝奪可能具有更大的震撼，因爲嬰兒時期主要需要的滿足是來自母親。既然權威人格受到伊底帕斯階段的影響至深且鉅，則具有權威人格的母親與父親兩者人數應當相若，只能說社會化的過程將母親放進了一個依附的角色中，所以缺乏表達侵略性的社會機制，但卻不能因此排除母親在權威人格養成中的促進作用。^⑰

無論如何，幼兒不敢對父母權威反抗，從而要求更大的權力來補償自己獲得不到的需要時，就發生了投射與轉移，因此某個外在對象的挑選，自然成爲權威人格者自己達不到目標，擔心自己無能時的代罪羔羊。^⑱對這個代罪羔羊的種種壓迫又必須靠著一個外在的權威來領導，因爲權威人格者的不安全感來自於無法認同自己的父母，但又不能承認這種令人產生罪惡感的深層傾向，從而常表現成對自己父母不切實際的美化，勢必就加深了內心的焦慮。^⑲這個時候，如果出現有權威的人來領導，很容易滋生依附心理，使得自己在誇耀吹噓，自我膨脹的心虛狀態中，仍有一個高不可攀的靠山。這種性格與早年成長經驗中曾受到刻意耍逗、拒絕的背景有關，^⑳使幼兒在得不到又渴望，渴望不到又憤怒的情境下，開始對外在的批評、權力關係、面子極度敏感。

註⑮ Harold Laswell, *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

註⑯ R. E. Money-Kyde, *Psychoanalysis and Politics: 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s and Morals* (New York: Norton, 1951) .

註⑰ N. W. Ackerman and M. Jahoda, *Anti-Semitism and Emotional Disorder: A Psychoanalytic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Harper, 1950) .

註⑱ Christel Hopf, "Authoritarian and Their Families: Qualitative Studies on the Origins of Authoritarian Dispositions," in W. F. Stone, G. Lederer and R. Christie, eds., *op. cit.*, pp. 119~143.

註⑲ M. Main and R. Goldwyn, "Predicting Rejection of Her Infant from Mother's Representation of Her Own Experience: Implication for the Abused-Abusing Intergenerational Cycle,"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Vol. 8 (1984) , pp. 203~217.

註⑳ M. Main and D. K. Weston, "Avoidance of the Attachment Figure in Infancy: Descrip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in C. M. Parkers and J. Stevenson-Hinde, eds., *The Placement of Attachment in Human Behavio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 pp. 31~59.



自我中心的傾向透露出權威人格也是一種自戀人格。自戀的概念是由 Freud 率先提出，是指幼兒將對外物的愛戀轉移到自己身上，這種發展使人無法將感情投注在別人或事情上，^②並誇大自己的成就，追求不切實際的目標，生活中經常出現成功的臆想。固然自戀性格可以趨策人邁向成功，甚至做出對社會有貢獻的事，然而成功與貢獻並不是快樂的真正來源，獲得認可、掌聲、榮耀才是更深層的需要。^③這就註定了自戀人格者永無止盡追求萬能的地位，他們的政治行動因而將充滿風險，但卻能展現不可理解的信心。同樣地，自戀人格者忽略他人的存在，沒有將心比心的同情能力，對支持他們的人沒有情感的聯繫，在成功之後往往輕易拋棄之。最大的弱點在於其心靈深處的脆弱使自戀人格者不承認自己的無知，這造成學習上的障礙與對世界局勢的僵化認知，則跟隨他們的人也就必須唯唯諾諾。^④

自戀人格需要敵人，並且傾向看輕敵人的能力，誇大敵人和自己的差別，以便維持敵人的存在。^⑤這使得看上去信心十足的自戀人格者時而表現出恐懼，因為他們的敵人無所不在，這種照說應該是不成對手的敵人，因為自戀人格者自己的創造而始終揮之不去，他們對外在對象的高度攻擊性反映了這種恐懼。^⑥當自戀需求不能滿足的時候，常導致激烈的報復行動。故自戀可以說是權威人格的深層驅動力，說明了權威人格者在政治行動上充滿對抗性與依附性的矛盾現象，也說明了被剝奪與被溺愛的兩種權威人格特質之間的互補作用。

肆、退化與驚恐

自戀傾向的人沒有正常的人我分際觀念，對於權力既愛又怕，與外界的人接觸不是追求絕對的優勢，就是迅速的臣服。通常叛逆性格強的人就有自戀傾向，這些激進的運動力量通常喜歡以抽象的觀念來理解人際關係，並摒除血肉人情脈絡的體會，而且參與激進運動的人傾向將自己交付給一個萬能的領導，對權力的需要與依賴，超過對成就的需要，^⑦這些與權威人格的徵候大體一致，但從而又產生了對自己獨立自主能力的極度敏感，使得自戀人格處在一種認同的困境中：一方面他們想要與占有優勢的壓迫者認同，以安撫自己無能的焦慮，另一方面又想與受迫害的人認同，藉由抗拒來展現自己的獨立自主性。故出現了為反對而反對的行為，以能證明自己的獨立自主，

註② Sigmund Freud, *Collected in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Garden City, n. p., 1943), pp. 363 ~ 365.

註③ Otto Kernberg, *Borderline Conditions and Pathological Narcissism* (New York: Jason Aronson, 1975).

註④ Jerrold M. Post, " Current Concepts of the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Implications for Political Psychology,"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4, No. 1 (1993), pp. 99 ~ 121.

註⑤ V. Volkan, *The Need to Have Enemies and Allies* (New York: Jason Aronson, 1988).

註⑥ Otto Kernberg, *Serious Personality Disord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註⑦ Stanley Rothman and S. R. Lithner, *Roots of Radicalism: Jews, Christians and the New Lef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同時又還能表現對權威的依賴。^②

權威人格者在從人際關係中退化下來的時候，變得更加僵化，他們不接受新的訊息與社會變遷，因此或成為保守主義的溫床，或是基本教義派的中堅力量。對於複雜的訊息，他們傾向用簡化的方式去理解，^③容易在面對擁有不同信仰的人時出現焦慮，^④更常用懲罰的手段對付對手。^⑤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缺乏規範的時候，自戀性格者會因缺乏敵人的存在而感到空虛，嚴重的情況下會產生錯覺，於是形成被迫害的妄想，所有外於己的人與物都成為威脅，導致人進一步的退化。這種狀況下的人具有高度的攻擊性，對權力的愛憎情緒極端化，來回在極度的無能與絕對的萬能世界中，這在政治上就是戰爭、革命、屠殺。

被迫害妄想在古典政治哲學中斑斑可考，即人們將對自己的莫名恐懼不斷投射在對象身上，造成了無法解決的困境。於是乎，本來是自發性的事物被當成了破壞規矩的亂象；不可測知的事物則被當成了威脅的來源。此何以對法律、秩序的絕對服從，反映的是集體被迫害妄想症。在柏拉圖的理想國和霍布斯的巨靈中就有這種徵候：人們都對自然狀態充滿排斥，而所謂自然狀態就是人在沒有秩序的情況下相互拼鬥，故似乎他們要處理的問題都不在真正的自然狀態中，而是在社會內部。這裡透露出一種古人面對自然狀態的無力感，可是自然狀態帶來的威脅，卻又說是存在於社會內部，故鼓勵政治人物對內部團結與秩序要絕對掌握，這正反映了萬能權力的想像，好像沒有這種萬能的權力，人就將陷入自然狀態的深淵之中，失去了自己；偏偏這個恐怕會失去的自己，其實又不真的是自私的自己，而是與自己結成一個大集體的理想國或巨靈。^⑥可見，人的集體認同在一定程度上是奠立在被自己迫害的妄想之上的。

如此一來，恐懼被制度化了，孩提時期遭到剝奪的伊底帕斯徵候，竟成了道德與信仰的內容，換言之，人們習以為常的古典政治理論，其實是反映了一種人類文化的病態，把人們所不能接受的自己最自私、無能的一面，由政治制度加以約束，好像人的慾念、情感真的可以經由理性來控制，使意外事件降至最低，如此取得的穩定性其實反而扼殺了發展與創新，^⑦將人侷限在固定的角色中。不過，像類似妄想的徵候在現實政治之中如此地普遍，恰恰說明了權威人格的因子無所不在，正等待著適當的情境召喚，就會風起雲湧地應和領袖人物瘋狂的征服行動，來投射深層積壓的對自己無能的焦慮。

註^② M. Meissner, *The Paranoid Process* (New York: Jason Aronson, 1978) .

註^③ L. Berkowitz, "Judgmental Processes in Personality Function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67 (1960), pp. 130~142.

註^④ M. Rokeach, *The Open and Closed Min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0) .

註^⑤ M. Freedman, H. Webster, and N. Sanford, "A Study of Authoritarianism and Psychopathology,"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41 (1956), pp. 315~322.

註^⑥ M. Eigen, *The Psychotic Core* (New York: Jason Aronson, 1986) .

註^⑦ James Glass, "Notes on the Paranoid Factor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Fear, Anxiety, and Domina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9, No. 2 (1988), pp. 209~228.



爲什麼這種退化與驚恐的人格，與人我分際混淆的社會至今如此普遍呢？這又與近代歷史的發展有關。過去的人敬天祭祖也是認識到自己的渺小，但那時人們追求的人際關係沒有強烈的自我觀念，等到宗教改革發生，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成爲一種主體與客體的關係後，每個人的上面有一個代表上帝的「超我」（Superego）在支持，使人與人之間的共生關係斷裂，^④而人的生命益加奠基在世俗化的物質提昇上，不再受到人情脈絡的羈絆，則人在情感方面受到的壓抑，投射到對世俗世界的權力爭取上。這個歷史發展既是民主自由制度的依據，^⑤也同時是權威人格的搖籃，人在自私自利與宗教懺悔之間擺盪，慢慢的，爲家庭無償生產的生活實踐，變成了爲自己而消費的市場制度，新的中產階級父母無法提供家庭的呵護關愛，他們在二次大戰之成爲社會主流，而他們的孩子剛好就是六〇年代末期學運的中堅分子。^⑥

這裡有兩種評估。一種是認爲現代社會游移多變的認同太複雜，太多重，顛覆了人的主體意識，造成人我分際混淆，強迫社會關係發生退化；^⑦另一種則是認爲對主體意識的強調太抽象，太勉強，違悖了宗教改革之前的社會人情脈絡，因此反而削弱社會對人的支持。^⑧雖然診斷不同，兩者都將人我分際的混淆與退化，看成是自戀性格發生的主要直接原因。不過，後者的看法比較合乎歷史實際，畢竟除了歐美之外，大多數社會都是以社會人情脈絡爲主的，故前者將自我的存在，假設是先於社會的存在，因此而提出應該強化、回歸自我主體性的藥方，恐怕是有問題的。^⑨

伍、政治行為

自戀性格形成的原因或是被溺愛，或是被剝奪，則成長之後所養成的權威人格也出現不同類型。一種是追求偶像的權威人格，他們需要有個領導人像萬能的父母一樣照顧他們，否則無法克服孤寂與疏離，這在社會經濟條件出現危機的時候尤其如此，因爲自戀傾向受到壓抑的時候，人們特別渴求接受領導，^⑩領導人的成功就好像是自己的成功。但倘若他不能夠表現成無堅不摧的話，追隨者經過一段時間的自我矇騙，

註④ 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

註⑤ E. Shorter,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Famil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

註⑥ K. Keniston, *Young Radicals: Notes on Committed Youth*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8) .

註⑦ James Glass, "Multiplicity, Identity, and the Horrors of Selfhood: Failures in the Postmodern Posi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4, No. 2 (1993), pp. 255~277.

註⑧ Stanley Rothman, "Ideology Authoritarianism and Mental Health,"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5, No. 3 (1984), pp. 341~363.

註⑨ Leon Balter, "Books Review,"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8, No. 2 (1987), pp. 279~283.

註⑩ M. Galanter, "Psychological Induction into the Lorge Group,"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Vol. 137 (1980), p. 12.



視而不見之後，接著會出現憤怒與失望的情緒。對心理健康的人尚且如此，何況是自戀傾向強的人了。^①要是在恐懼與猶疑中的人，能夠避免面對不確定的環境，由偶像來替自己決策，承擔風險，將使他們弭平焦慮，回歸自己仍居世界中心的安適。偶像告訴我們，問題不在我們，而在某某人，某某團體。當然，這種盲目的追隨有時有助於社會從分裂中癒合，不過這要看導者本身的傾向了。^②

另一種類型是追求鏡像的權威人格，他們渴望接受無止盡的崇拜，以彌補自己受傷的心靈，在外在行為上表現出英勇無所不能的力量，傳達絕對的信心與定力，但也因此，他們採納非黑即白的政治邏輯是不可避免的，於是世界上只剩下兩種人，對的與錯的，正的與邪的，自己則甚至自比聖跡聖行。恐怕自戀傾向濃的人，是真的相信自己是有神助的，^③小羅斯福總統就是常為人引用的例子，他滿口引述聖經，自比摩西；另一個例子是前伊朗宗教領袖何梅尼。^④其結果，領導人常常表現成有受迫害妄想，率領著子民去殲滅想像的敵人。^⑤如前所述，這是一個屬於「毀滅性的領導風格」的領袖，它把領導者所痛恨的自己（那個不受父母歡迎的孩子）投射到外在的敵人身上，希特勒的反猶太主義正是如此，而面臨當時德國空前的經濟蕭條，政治動盪與社會暴力，德國人民轉而依附在反猶太主義這種簡單的政治邏輯上。相對於此，若是一個「治療性的領導風格」的領袖，則會透過癒合國家民族的分裂，來間接治療領導者本人的創傷。^⑥

權威人格者固然在危機之中容易崛起，群眾的自戀傾向也在動盪中更快暴露出來，可是在一個複雜的現代國家體系中，權威人格者卻不太可能成為領導者，^⑦因為要成為領導者的話，他必須經過複雜的程序，與大量的人週旋，這在極權國家比在民主國家尤其如此，蓋那兒關係比選票更重要，權威人格者自然不容易獲得太多的支持。同時，一般政治組織在決策中一旦有權威人格的因素介入，其對特定事件的態度就比較不容易轉變，甚至還會因為某些新訊息的出現變得更保守。^⑧權威人格介入的決策過

註① W. Bion, *Experiences in Groups* (London: Tavistock Press, 1961) .

註② V. Volkan and N. Itzkowitz, *The Immortal Atatu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

註③ Jerrold M. Post, "Narcissism and the Charismatic Leader-Follower Relationship,"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7, No. 4 (1986), pp. 675~688.

註④ A. R. Wilner, *The Spellbind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註⑤ R. Robins, "Paranoid and Charism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Toronto, 1984.

註⑥ Heinz Kohut, "Creativeness, Charisma, Group Psychology," in G. E. Gedo and G. H. Pollock, eds. *Freud - The Fusion of Science and Human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379~425.

註⑦ Laswell, "The Selective Effect of Personality," *loc. cit.*

註⑧ M. Wagman, "Attitude Change and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40 (1955), pp. 3~24.



程，會呈現出較高的侵略性，與同僚之間較難培養出正面的情感，而且他們會有自我孤立的行動，^④這說明了何以權威人格者對於用討論比用接受指示更難適應，^⑤他們不信任同儕，但卻較容易受到團體的影響而聽從社會壓力。^⑥這裡看出他們受權威人士影響的程度，大過於受同儕社會壓力的程度，當兩者抵觸時，權威人格會與同儕疏遠。^⑦當他擔任領導角色時，比較重視目標，而忽略與下屬的關係或他們的意見，^⑧但在上司眼裡，他則比較可靠。^⑨

權威人格者領導的革命是否有較大的成功機會呢？革命是一種對現實世界的犧牲，領導革命的人通常不是在現實世界中一無所得的人，因此當革命家放棄社會地位，去領導與自己屬於不同階層的人推翻政府時，的確需要一定的人格背景。首先，革命家必須能切斷世俗的人情關係，對於自戀性格的人而言，這是相對容易做到的事，他們原本就未從人情關係中獲得溫暖，自然也就比較不會有所留戀，故而能夠用相對抽象的角度來思索人與人之間的關係。^⑩不過，列寧在這方面似乎是個明顯的例外，但儘管證據在顯示他不是自戀人格，但他刻意讓自己不受人情影響則是事實。^⑪

其次，革命家對於痛苦與折磨似乎有一定程度的享受。即使他們不是刻意地去追求痛苦與折磨，也要設法做到讓自己的利益好像不再是考慮的重點，這裡提出的是一個「群我」（group self）的概念，則自戀就昇高成爲對群我的投入，也就是極端的自戀，從而形成了無我的境界。^⑫但這種無我，是一種世俗的無我，在精神的深層，則仍然是絕對的自我，因群我的目標和利益終究是由革命家欽定的，群眾追隨的也是革命家，故在革命家的抽象道德世界的下面，必須是對權力的渴望，只有這種渴望才能說明革命的龐大動因。在相當多的例子裡，這個動因是來自於革命家的母親們堅決要求自己的孩子，必須有所成就，攫取公共領域的權力，好彌補母親們因爲無法發揮自

註④ W. Haythorn et al., "The Behavior of Authoritarian and Equalitarian Personalities in Small Groups," *Human Relations*, Vol. 9 (1956), pp. 57~74.

註⑤ S. Zagona and L. Zurcher, "Participation, Interaction, and Role Behavior in Groups Selected from the Extreme of the Open-closed Cognitive Continuum,"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58 (1964), pp. 255~264.

註⑥ J. Lasky, "Effect of Prestige Suggestion and Peer Standards on California F Scale Scores," *Psychological Reports*, Vol. 11 (1962), pp. 187~191.

註⑦ L. Berkowitz and R. M. Lundy,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Related to Susceptibility to Influence by Peers or Authority Figur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Vol. 25 (1957), pp. 306~316.

註⑧ W. Haythorn et al., "The Effects of Varying Combinations of Authoritarian and Equalitarian Leaders and Follower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3 (1956), pp. 210~219.

註⑨ R. Kahn et al., *Organizational Stress: Studies in Role Conflict and Ambiguity* (New York: Wiley, 1964).

註⑩ Bruce Mazlish, *The Revolutionary Ascetic: Evolution of a Political Typ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註⑪ Angus McIntyre, "Book Review,"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6, No. 3 (1985), pp. 529~533.

註⑫ William H. Blanchard, *Revolutionary Morality: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Twelve Revolutionists* (Santa Barbara: ABC-CLIO, 1984).



己才能的遺憾。㉔否則，群我的概念一旦脫離革命家的控制，必然就無法帶來權力的滿足了。

陸、政治態度

權威人格理論引起最大爭議的部分，就是關於F量表的設計。F量表的內容測量一個人的法西斯傾向，包括對種族主義、共產主義、政治反對黨派、社會主義的看法。㉕根據權威人格理論，擁有這種人格的人會傾向一定的政治態度，這些政治態度具有反映權威人格的功能，故對於家庭威轉化成反猶太主義，不過這個量表在美國工人階級當中採用的時候，得到的結果並不一致。後來又相繼出現了許多其他修正過的量表，比如測量經驗的E量表、測量僵化程度的D量表，㉖經過平衡的F量表。㉗照權威人格理論的說法，右派的、保守的政治態度具有幾個深層的傾向：

- 一、對外在團體具有高度的敵意；
- 二、對於自己所屬的團體絕對的服從；
- 三、在自己所屬的團體和外在團體之間界限分明；
- 四、習慣把人根據某些標準做出非友即敵的分類；
- 五、把世界看成了充滿衝突的鬥爭場所；
- 六、對理論性的分析抱持著不屑的態度；
- 七、看到別人情感流露的情緒時會覺得厭惡；
- 八、相信有人企圖操控自己所屬的團體，認為只有去操控外在團體才能讓自己的團體存活；
- 九、面對衝突與混亂的環境，仍保有一個未來和諧社會的理想。

前述權威人格理論的出籠，是左派猶太裔學者、精神分析學派與美國猶太裔財團的巧妙結合，自然在冷戰時期會引發疑慮。事實上，這個理論引起最多的質疑就是，為什麼左派不能擁有權威人格？於是有人羅列了蘇聯共產黨的一些特徵：要求黨員對共黨絕對效忠、無止盡地發動階級鬥爭、不斷地進行敵我的畫分、凡事都看階級成分、把歷史看成是階級鬥爭史、認為理論與學術是統治階級的工具、提出科學的社會主義來糾正懦弱的親情主義、主張無產階級全面專政、嚮往無階級的共產天堂等，㉘說明左派的權威人格不亞於右派。換言之，左派與右派是政治態度之分，

註㉔ A. F. Davis, *Skills, Outlooks, and Passions: A Psychoanalyt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註㉕ B. Altemeyer, *Enemies of Freedom: Understanding 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8).

註㉖ M. Rokeach,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Dogmatism: An Alternative to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Vol. 70 (1956), p. 18.

註㉗ John J. Ray, "Why the F Scale Predicts Racism: A Critical Review,"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9, No. 4 (1988), pp. 671~679.



無關乎權威人格。

如果進一步審視 Adorno 等人進行的訪問稿，的確發現有不少左派雖然在 F 量表上得分不高，但卻具有一樣的精神傾向，比如他們在言詞中透露出某種壓抑，對模稜兩可狀態不能容忍。相對於此，在 F 量表上得高分的人雖然在政治態度上與法西斯主義相類似，但卻可能與人格無關，而是反映了他們受當時社會氣氛感染，或因為他們缺乏適當的語言能力來避免被引導。^⑤事實上，得高分的人似乎有一定社會經濟背景，大多數都是來自中下階層，^⑥假如社經條件是主要因素，則人格因素的解釋不攻自破。他們在對父親權威的潛在反抗方面固然經由訪談有所透露，但同樣的潛在反抗在得分不高的受訪者中也一樣存在。簡言之，F 量表所測的東西可能只是一組高度相關的政治態度，不是人格特質。但是儘管它問題百出，並不能因此否定權威人格理論其他有關精神分析的部分。同時，由於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一書在法西斯主義相關的政治態度方面找到的保守、服從、攻擊傾向三者之間的關聯，^⑦有相當的啟發性，故可稱 F 量表為右派權威人格量表，從而不排除可以設計出一套左派的（或任何其他政治態度的）權威人格量表。

另一方面，由於左派的政治態度是強調人與人的平等，和權威人格傾向種族歧視似乎確有不同，這一定程度說明了共黨早期招募黨員時出現新黨員流失的現象。^⑧爾後的研究發現，僵化性格與右派的政治態度確實具有正相關，而左派權威人格存在的證據則不明顯。^⑨但如果從持左派價值和態度的人的認知能力來分析，則又發現極端左派有權威人格特質。^⑩然而認知能力受到社會經濟條件影響至鉅，故應該並非屬於所謂左派政治人物特有的人格因素，也就是說左派的認知為何無關乎人格，因此仍不能就此證明左派權威人格的存在。^⑪

一項對前蘇聯人民的研究就發現，其權威人格程度低於美國人民，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前蘇聯人民順從性較高，所以較一致地接受八九年之後的新政治形勢，故較低的權威人格評分其實仍是反映了權威人格傾向；另一個解釋是蘇聯政府的極權性格壓抑

註② Edward A. Shils, "Authoritarianism: 'Right' and 'Left'", in R. Christie and M. Jahoda, eds.,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Continuities in Social Research*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4), pp. 24~49.

註③ Herbert H. Hyman, and Paul B. Sheatsley,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in R. Christie and M. Jahoda, eds.,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Continuities in Social Research*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4), pp. 50~122.

註④ Harold Laswell, *Psychopathology of Politics*.

註⑤ R. A. Altemeyer, *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 (Winnipeg: University of Manitoba Press, 1981).

註⑥ Rokeach, *The Open and Closed Mind*, op. cit.

註⑦ H. Tarr and M. Lorr, "A Comparison of Right Wing Authoritarianism, Conformity, and Conservatism,"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 Vol. 12 (1991), pp. 307~311.

註⑧ Philp E. Tetlock, "Cognitive Style and Political Belief Systems in the British House of Comm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46 (1984), pp. 365~375.

註⑨ William F. Stone, and Laurence O. Smith, "Authoritarianism: Left and Right," in W. F. Stone, G. Lederer, and R. Christie, eds., op. cit., pp. 144~156.



了家庭中的父權，故社會整體的權威人格傾向確實降低了。此外，在蘇聯，左派應該是指那些支持西方所謂右派信仰的人，而右派反而是主張共產主義的人。不過在民族主義方面，俄羅斯民族主義仍應屬於右派，這與西方相同。如果用這個分類角度測量前蘇聯，那裡的權威人格就仍和右派相關。^⑩值得提出的，是前蘇聯人民的個人經驗對政治態度的影響遠遠低於美國人民，這應該是共黨統治下人們已學習將經驗與心態分開的結果。同理，前蘇聯人民的政治態度對政治行為的影響，也比美國人要低很多。總的來說，權威人格在多少程度上要用政治態度來表達，仍然缺乏完全可靠的資訊來下結論，只能說較多研究顯示，右派政治態度與權威人格有正相關，則應無爭論。^⑪

F 量表成功之處，是它總是與種族主義出現正相關，這引起了一些辯論。由於涉及種族主義，因此辯論往往極為情緒化。其實，在三〇年代之前，主張種族主義是一種社會地位的表現，而 F 量表當中許多語言的表達方式，也的確具有「老派」(old-fashion) 的風格。由於老派的人不會隱藏自己對不同少數族裔的歧視態度，故 F 量表據稱是個「老派」量表，所測得的種族主義不是真的種族主義，或者說這種種族主義不是來自於人們對權威的服從性格。^⑫此外，反對 F 量表的人辯稱，種族主義既不必來自於保守主義，更非當代保守主義者所主張。至於近數十年來相關研究的以學生當作訪談對象，這更令人懷疑，所謂保守主義傾向的受訪者，並不是真正的保守主義，而是無法融入自由主義校園的「老派」學生。支持 F 量表的人反駁認為，獄囚的權威人格傾向一般偏高，但獄囚並不能稱之為老派，如果說獄囚是無法融入自由主義社會的人，就稱之為老派，那老派的範圍何在呢？所以問題是出在分析家自己有種族主義傾向，故才不承認 F 量表的準確性。^⑬

這些辯論不會終止，因為這不僅是一場學術辯論，更涉及到學術界的個人認同與情感，與人們在政治態度上的歧異。可見，關於權威人格與右派政治態度之間的聯繫，傷害到持右派政治態度的學者，其間主要的原因，正是權威人格的概念本身帶有太多負面的歷史教訓，使人總是將權威人格與反猶太主義、法西斯主義放在一起。所以儘管學術界對於權威人格理論的前提、方法、推論都批評不斷，而且新的修正的理論不斷出現，但一旦有人就某些觀點正面交鋒時，很容易就又会回到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一書的原點。

註⑩ Sam McFarland, Vladimir Ageyev, and Marina Abalakina,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W. F. William, G. Lederer, and R. Christie, eds., *op. cit.*, pp. 199~225.

註⑪ John P. Kirscht and Ronald Dillehay, *Dimensions of Authoritarianism: A Review of Research and Theory*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67) .

註⑫ John J. Ray, "A New Balanced F Scale - And Its Relation to Social Class," *Australian Psychologist*, Vol. 7 (1972), pp. 155~166.

註⑬ William Eckhardt, "Comments on Ray's Why The F Scale Predicts Racism: A Critical Review,"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9, No. 4 (1988), pp. 681~691.



柒、權威人格的認知

人格會不會影響到認知結構，在近三十年認知心理學大行其道的時刻，也受到十分的注意，比如權威人格的發生被指出是經由社會學習得來的，而又以模仿父母為主，故家庭暴力往往在權威人格傾向高的受訪者父母經驗中較頻繁，攻擊性傾向強的人，其對象往往是社會情境所認可的目標，比如對少數族裔的敵意相對低於對同志團體的敵意。^④更多的研究，則是在分析那些F量表上得高分的人，在認知上具有那些特徵。

比如，權威人格傾向是否真的會妨礙人們判斷其他人事物的特性？會欣賞具有權威特質的領導人？會強調權力的因素？但實際研究顯示不出得高分的在這種認知上的誤判會與得分低的人有何不同，不過，得分高的人在研究中顯得比較不接受好也會有一些壞的特質，^⑤F量表得分低的孩子在認知的測驗中表現比較好。^⑥另外，關於權威人格者對外團體的歧視方面，研究顯示這種歧視與種族的關聯不大，而與信仰和態度的差異有較大的關聯，故對黑人團體的排斥，未必是因為他們是黑人，而是因為他們對事情持有不同的信仰或態度，這與一個天主教徒看待新教徒的態度雷同。^⑦但也有研究得出相反的結論。^⑧折衷的人則發現，種族與信仰這兩個因素都有關，但認知次序不同，即對外團體的偏見首先是來自於信仰的差異，但是如果對方信仰的內容不確定，或說得不清楚，權威人格傾向者會根據對這個外團體所持信仰的有關印象，以及感情和體制上彼此相對的立場，向對方作出行為反應。^⑨

權威人格的人碰到問題時所採行的解決方案比較缺乏彈性，即令在客觀環境要求人們要改用其他方式的時候，似乎也沒有能力進行調整。^⑩許多人在這方面反覆地進行實驗，^⑪根據統計，這類研究中，有六個發現權威人格對解決問題的彈性有影響，

註④ Altemeyer, *Enemies of freedom*, *op. cit.*

註⑤ I. Steiner and H. Johnson, "Authoritarianism and Tolerance of Trait Inconsistency,"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Psychology*, Vol. 67 (1963), pp. 388~392.

註⑥ B. Kutner and N. Gordon, "Cognitive Functioning and Prejudice: A Nine-year Follow-up Study," *Sociometry*, Vol. 27 (1964), pp. 66~74.

註⑦ Rokeach, *The Open and Closed Mind*.

註⑧ H. Triandis, E. Davis, and S. Takezana, "Some Determinants of Social Distance among American, German and Japanese Stud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2 (1965), pp. 540~551.

註⑨ D. Stein, J. Hardyck, and M. B. Smith, "Race and Belief: An Open and Shut Cas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1 (1965), pp. 281~289.

註⑩ M. Rokeach, "Generalized Mental Rigidity as a Factor in Ethnocentrism,"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43 (1948), pp. 259~278.

註⑪ R. W. Brown, "A Determina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gidity and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48 (1953), pp. 469~476; E. E. Levitt and, S. L. Zelen, "The Validity of the Einstellung Test as a Measure of Rigidity,"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48 (1953), pp. 573~580; E. G. French, "Interrelation among Some Measures of Rigidity under Stress and Nonstress Condition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1 (1955), pp. 114~118; W. G. Bringmann, "Re-examination of Ethnocentrism and Problem Solving Rigidity," *Psychological Reports*, Vol. 20 (1967), pp. 1069~1070.



有一個發現有幫助，有十三個的結果並不明顯，這裡面的研究程序可能對研究結果起了一些作用。如果研究者在進行測試的時候營造了一種權威的氣氛，使受測者在受到感染情況下作答，這才比較能看出來權威人格對於決策彈性的影響。在上述研究中，只有一個是曾明顯刻意營造權威氣氛，但卻沒有得到預期結果的。但那次測驗對象是軍校學生，執行測驗是一位女教官，故對權威氣氛的營造可能起不了太大作用。②

另外一個研究重點是權威人格者的懲罰傾向，即當人們遇到違反社會規範的人時，會採什麼樣的立場對待他們，會不會受到違反者的身分地位所影響。這方面的研究與實驗也很多，③基本上發現權威人格傾向高的人，明顯地對犯罪的人給予較高的懲罰，而且，如果犯罪的人的社會地位愈低，所給予的懲罰愈高，這和權威人格傾向低的人相反，後者對於社會地位較高的人在犯下同一種刑案時，所給予的懲罰則較高。這種差別在不同程度的案件上都一致，但當犯罪程度愈重時，權威人格傾向高的人所給予的懲罰，比權威人格傾向低的人所給予的懲罰，要高得更多一些。④

在與政治態度研究方面一樣的是，關於權威人格影響認知複雜度和調整彈性的研究，也有人根本質疑，認為認知是一個多面向，受環境左右的現象，根本不屬於人格特質的範圍，把權威人格研究包裝改造成「對模稜兩可的難以容忍」的認知研究，只是新瓶裝舊酒。何況，在某一個角度裡看起來是僵化的反應，從另一個角度而言不見得還能稱之為僵化。⑤故應該把僵化分類，如此可以看出權威人格傾向者可能在某些方面的認知結構十分複雜。⑥

其他研究則指出，在右派到左派的量表上，人們認知複雜程度的變化是多樣的，的確不像權威人格理論所隱含的那樣線性而單純。不過，在種族主義方面，權威人格理論的主張似乎有許多經驗研究可以證實，即如果種族主義傾向愈高，則認知的僵化程度也愈高，對模稜兩可狀態的容忍就愈低，觀念抽象性愈高，在認知上將事件定位

註② Richard Christie, "Some Experimental Approaches to Authoritarianism," in W. F. Stone, G. Lederer, and R. Christie, eds., *op. cit.*, pp. 70~118.

註③ V. R. Boehm, "Mr. Prejudice, Miss Sympathy, and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Wisconsin Law Review*, 1968, pp. 734~750; G. R. Newman, D. J. Articulo, and C. Thrilling, "Authoritarianism, Religiosity and Reactions to Deviance," *Journal of Criminals Justice*, Vol. 2 (1974), pp. 249~259; R. M. Bray and A. M. Noble, "Authoritarianism and Decisions of Mock Juries: Evidence of Jury Bias and Group Polariz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36 (1978) pp. 1424~1430; D. F. Zwillenberg, *Predicting Biases in the Punishment of Criminals as a Function of Authoritarianism: The Effects of Severity of the Crime, Degree of Mitigating Circumstances and Status of the Offender*,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L. Garcia, and W. Griffitt, "Evaluation and Recall of Evidence in the Patty Hearst Cas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Vol. 12 (1978), pp. 57~67.

註④ Christie, "Some Experimental Approaches to Authoritarianism," *loc. cit.*

註⑤ John J. Ray, "Cognitive Style as a Predictor of Authoritarianism, Conservatism and Review: A Fantasy in Many Movement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9, No. 2 (1988), pp. 303~308.

註⑥ J. A. Hageseth, "Relationships Among Cognitive Complexity Variables," *Psychological Reports*, Vol. 52 (1983), pp. 473~474.



的時間愈早，抽象觀念能力愈強，對事件特質之間的矛盾性接受愈低，對他人看法上的偏差愈多。^⑧這些經驗研究雖然有其設計與執行上的爭議性，但大體顯示權威人格當中的一些特質確實與認知結構有某種相關。鑒於權威人格理論本身是精神分析的作品，則如何將精神分析與當代最流行的認知心理分析作邏輯上的銜接，似乎是研究權威人格認知心理的當務之急。權威人格和認知之間的關係是由人格本身決定的呢？還是由其他環境因素所決定？認知心理分析對外在環境的重視，使得關於認同的研究重要性突出了。在精神分析和認知之間，認同也許是一個很好的銜接點。

捌、集體認同

權威人格研究另一項缺點，就是從個人的人格特質出發，想要依此來分析整體的社會現象，因此就難免在方法學上產生了個人主義的偏差，也就是研究者必須假設，先有個人才有社會，而個人的人格特質完整與否，以及是不是人我分際清楚明白，則是研究者所最關心的問題。在經驗研究成爲美國心理學的主流之後，這種以個人爲研究對象的風氣，瀰漫心理學界，使得權威人格理論分析的焦點，都集中在人與人之間彼此的態度，忽略掉人與他們所屬的集團，或人的社會位置，對於行爲和態度的影響程度，可能不亞於人內在的人格特質所引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社會位置和集體認同兩者與人格特質之間必然會起一些交互作用，從而對於行爲與態度的影響造成更爲複雜的脈絡。當不同集體認同之間也產生互動時，對研究者的挑戰勢必益加鉅大。如今權威人格研究將集體行爲化約成個人行爲來解釋，把整個方向都扭曲了。^⑨

但權威人格理論本身處處隱含著重要的集體認同因素，前述公認的權威人格三個面向——保守主義、服從、攻擊性——就可以抽離出集體對個人所產生的制約：

- 一、保守主義面向說明了社會規範和行爲準則對個人造成必須順從的制約力量；
- 二、服從面向說明了個人對於團體的領導人必須有無條件的尊敬與追隨的制約力量；
- 三、攻擊性面向說明了團體成員如果不遵守紀律，將面臨嚴厲懲罰而不被容忍的制約力量。

因此，假如不討論個人對於集體的認同，權威人格的分析就不能窺及全貌。^⑩因而有人主張，不僅人有權威人格，社會集體也可以有權威人格。社會集體的權威主義是關係到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規範，但在個人層面當然仍是指行爲和態度。故謂權威人格的研究重點應該放在規範和態度之間的互動上，則態度就不僅只是受人格影響而已，從而可以得出四種狀態：權威人格處於權威主義社會，權威人格處於非權威主義社會，

註^⑧ Jim Sidanius, "Cognitive Functioning and Socio-political Ideology Revisited,"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6 (1983), pp. 637~661.

註^⑨ H. Tajfel, *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註^⑩ John Duckitt, "Authoritarianism and Group Identification: A New View of an Old Construct,"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0, No. 1 (1989), pp. 63~84.



非權威人格處於權威主義社會，非權威人格處於非權威主義社會。但態度與規範發生衝突的時候，人可能選擇脫離社會，也可能會轉化，㉔也可能會反抗。反抗者可能是權威人格者（如法西斯），也可能不是權威人格（如美國獨立戰爭）。

人對集體認同的程度是權威人格的重要變數，一個人對於社會集體認同的程度愈強，則對於不屬社會集體的外在團體，就會有更清晰的歧視態度，否則不足以維持較好的自我形象；相反地，對外在團體的對抗性愈高，則社會認同愈強也愈團結，㉕而若社會集體認同愈明確，則社會權威主義力量也愈大，也就是說集體凝聚力量會更強，對社會規範的遵從程度更高，對不守規範的人容忍度更低，對集體領導的集中支持更大。但假如社會集體認同是因為人們的信心與安全感增高而加強，那麼對於外在團體的容忍與接受態度反而會增高，㉖同理，當人們對所屬集體的信心降低時，對外團體的歧視會增加。照這個理論來看，在F量表上得高分的人不一定是人格因素造成的，也可能是因為所屬的集體認同受到威脅，則一個社會的對外交往歷史比他的育兒方式更影響權威人格傾向。

玖、比較研究

權威人格的理論已經適用於各個地區，㉗包括蘇聯與美國㉘、荷蘭㉙、日本㉚、中國㉛，及歐洲的義大利與德國㉜等，其中亞洲部分約略介紹如下。日本的人格研究在日

-
- 註㉔ S. M. Sales, "Threat as a Factor in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28 (1973), pp. 44~57.
- 註㉕ R. A. Levin, and D. T. Campbell, *Ethnocentrism: Theories of Conflict, Ethnic Attitudes and Group Behavior* (New York: Wiley, 1972).
- 註㉖ J. W. Berry, "Multicultural Policy in Canada: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nalysis," *Canadian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 Vol. 16 (1984), pp. 353~357.
- 註㉗ Vinod K. Kool and John J. Ray, *Authoritarianism Across Cultures* (Bombay: Himalaya Publishing House, 1983).
- 註㉘ S. McFarland, V. Ageyev, and M. Abalakina, "The O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loc. cit.*
- 註㉙ J. D. Melon et al.,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Revival of Political Racism: Reassessments in the Netherlands of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oncept of Authoritarianism by Adomo et al.,"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9, No. 3 (1988), pp. 413~429.
- 註㉚ Takeo Doi, trans. by J. Bester, *The Anatomy of Dependence*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Ltd., 1973).
- 註㉛ Lucian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Analysis* (Cambridge: MIT Press, 1973); Richard Solomon,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 註㉜ Barbara Spackman, *Fascist Virilities: The Toric, Ideology, and Social Fantasy in Ital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Gerda Lederer, "Authoritarianism in German Adolescents: Trends and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in W. F. Stone, G. Lederer and R. Christie, eds., *op. cit.*, pp. 182~198.



本本身已汗牛充棟，但英文的並不多見。日本也是法西斯主義統治過的國家，威信人民有很強的依賴性格。在上級與下級之間往往存在一種特殊的忠誠義務關係，這種關係不是利害關係，下對上固然應當絕對服從，但在特定的情境下又可以有某種近似撒嬌的不規範要求。能夠有一個自己可以撒嬌的對象，就足以使人的心情安定，當這種關係發生轉變，便表示自己沒有人可以依賴，將引起焦慮。撒嬌是對壓抑的一種抒解，當這種抒解不能滿足時，就發生日本獨特的肛門文化。

所謂肛門文化，就是在日本的通俗漫畫之中，有極大的篇幅比例在表達對人的不滿時，用展露肛門、糞便、放屁的方式來呈現，而用小男孩的頻率又占其中的大多數。照精神分析的理解，這種肛門文化反映了伊底帕斯階段的阻塞。幼兒不能在獨立和親情之間找到良好的平衡點，他們對父親權威的反抗不敢表達，因而受到壓抑，故定期人們需要透過撒嬌式的不規範行為，來確保自己在權威壓抑之下，其實仍然受到喜愛。但在被壓抑到高度不滿的狀態時，則藉由漫畫中的肛門文化，來表達心中的不屑，這正是伊底帕斯階段最暢快自在的活動受到壓抑，藏在深層的證據。^④

中國人的權威人格研究是受到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而帶動，文化大革命之中紅衛兵的瘋狂鬥爭行動引起人們對中國人政治文化的好奇。中國人對權威服從與反抗是同時的，這正是權威人格的典型徵候。在中國，權力即是地位，有德的人就有地位，有德代表無私無我，天下為公，而道德力量就是教化的力量，因此權力、道德、地位、教化是一體的。^⑤道德教化與尊卑規範的學習是在餐桌之上，幼兒只能聽不能說，不聽話的懲罰往往是對口慾的拒絕，加上中國人育兒時對排便的訓練自出生一個月之後就已開始，因此多數人也無法通過伊底帕斯階段，蓋嬰幼兒時期就已經被要求自我控制，結果所謂自我控制，事實上是透過父母的制約來完成。

中國與日本的不同，在於權威的表達是經由口慾的滿足與剝奪，所以餐桌上小孩不能自己揀菜。談話、吃菜就成了權力地位的象徵，因此言論成了中國政治當中最敏感的行爲。說話不得體，引起社會整體的焦慮，好像有人自利為己，則天下不再為公，即那個能夠透過社會制約來引導天下的人不存在了。其結果，中國政治文化中有大量的壓抑不能表述出來，人們反彈的手法是透過羞辱，但中國人不盡是肛門文化，而更是罵街文化，罵街表示社會權威者失去民心，亦即不再有德，故罵街對上位者造成心理上的困擾。但在四九年之後，權威地位的奠定慢慢脫離了家庭，而由學校取代，^⑥可是這並不表示家庭地位不再重要。^⑦家庭育兒方式仍然對口慾的經驗極為重要，也影

註④ Kenneth Alan Adams & Lester Hill, Jr., "Protest Anality in Japanese Group-Fantasies," *The Journal of Psychohistory*, Vol. 5, No. 2 (1987), pp. 113~145.

註⑤ Lucian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Author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註⑥ Anita Chan,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

註⑦ White Tyrene, "Book Review,"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8, No. 2 (1987), pp. 249~254.



響中國人對權威與對自我的態度與情感傾向，正是在這個人格基礎上，學校的權威教育在起作用。

拾、結 論

精神分析是一個充滿了對現實社會挑戰的學問，權威人格則是一個反映了政治態度的觀念。^⑩五十年來的相關研究成百上千，動員了不知多少大學一年級的新鮮人當實驗對象，也採納了日新月異的統計方法，但精神分析與權威人格兩者結合所產生的政治效應，大致未隨著時間的增多而改變。權威人格理論自始就帶著猶太裔左派知識分子的色彩，後來雖然廣泛應用，甚至也解釋了社會主義中國的政治發展經驗，但畢竟中國不代表歐洲社會主義的主流，所以並沒有淡化這個理論的核心關懷，以致於即令是對六〇年代末期學生運動的分析，都引起了這派學者的反彈，因為把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學生看成是自戀性格，令他們很難接受。^⑪站在權威人格理論的初衷，被分析的應該是右派（即反社會主義）的種族主義（即反猶太主義）者。

一個新的面向在八〇年代中期之後加入了，即後現代人格與權威人格被發現有一個共通現象，即關於自我的界限不明確，人我的分際混淆。^⑫表現在行為反應上，同樣是社會人情關係退化，人際關係物化，侵略性增強，焦慮升高。當一個權威人格的社會，進入到後現代社會的發展階段時，這種行為上的癥候會不會加倍呢？儘管權威人格的研究似乎正走向一個死胡同，擺脫不了政治立場，而法西斯又正進入遙遠的歷史，不過東歐（與其他各地）的屠殺、種族認同問題的復甦，與後現代主義的蔓延，正在逐漸改變著當前學術界的政治生態，則權威人格研究恐怕又將獲得新的生機，只是這也代表他將繼續受到現實政治的左右。

* * *

（收件：87年9月2日，接受：87年9月21日）

註^⑩ Eckhardt, "Comments on Ray's Why The F Scale Predicts Racism: A Critical Review," *op. cit.*; Stanley Rothman, "Reply to Comments on 'Ideology Authoritarianism and Mental Health,'"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5, No. 4 (1984), pp. 761~769.

註^⑪ Steven R. Brown, "Comments on 'Ideology Authoritarianism, and Mental Health,'"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5, No. 4 (1984), pp. 753~760.



On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Chih-Yu Shih

Abstract

Studies on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and their psychoanalytical origin have been controversial throughout the century. The controversy has to do both with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se studies as well as their methodology and epistemology. The concept of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began as an explanation of the rise of fascism and later became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conservatism, orthodoxy, rebellion, and ethnocentrism. Analysts who do not belong to the left-wing, Jewish tradition first confronted the logic of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yet gradually learned to apply the concept to the study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as a peculiar way of rebuttal. More recent discussion has included the notion of narcissism and extended the scholarly interests to include the study of the so-called postmodern personality, which is believed by some to share many of the abnormal characters of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This article selectively reviews the literature and examines its theoretical potential for future development.

Keywords :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psychoanalysis, narcissism, political psychology, fascism

